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八日出版）

---

本期目录

---

【亡灵祭坛】	北京 1966 年 8 · 25 惨案纪实	叶林明 · 叶林辉
【拒绝遗忘】	雾霾下的文革历史	王友琴
【往事非烟】	不堪回首的安徽	朱柏生
【岁月沧桑】	对知青 50 周年的历史与哲学反思	邓晓芒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亡灵祭坛】

北京 1966 年 8 · 25 惨案纪实

· 叶林明 · 叶林辉 ·

（王友琴说明：在《文革受难者》书的 243 页上，在受难者“刘盼遂”的条目下，我写到北京师范大学叶苍岑教授的妻子被红卫兵打死。叶苍岑教授的妻子名字，当时没有能调查到。（刘盼遂的妻子梁秋色和刘盼遂一起被红卫兵毒打致死。当时没有能查到梁秋色的名字。她的名字是此书出版四年后才查到的。）在这本书出版十年之后，我终于和他们的孩子联络上了。（这里要感谢帮助联络的人。）叶苍岑教授的妻子名叫刘云，北京第 36 中学教师，在 1966 年 8 月 25 日被红卫兵打死。那正是北京红卫兵暴力的高潮时期。下面是刘云老师的孩子们的文章。）

我们的父亲母亲都是知识分子，毕生从事教育工作。父亲叶苍岑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知名教授（1993 年病逝）；母亲刘云曾在中学担任外语教师。

文化大革命中，他们都无端遭受到了非人的迫害，1966 年 8 月 25 日，我们的母亲刘云更是被一伙红卫兵暴徒当着她的亲生孩子们（叶林明和叶林辉）的面活活打死，场面惨不忍睹，事件经过如下：

（一）1966 年 8 月 23 日晚，我父亲叶苍岑所在单位师大中文系的一伙暴徒由其红卫兵头头隋延堂带领共六七人（记得其中有一个叫张宝生的）伙同同院内（北京西单武功卫胡同 11 号）造反派赵芝、赵敏、袁长山、张成运等冲入我家进行非法抄家活动。他们诬陷我父亲叶苍岑是“反动学术权威”，并指控我母亲刘云是地主婆（其实我母亲出身是中农），国民党员，家里藏有手枪等等。我父亲母亲当场驳斥这些都是无中生有。但这伙暴徒仍在我家乱摔乱砸，乱偷乱抢。他们毁坏书籍字画，往我家床上和衣物泼上脏水，吐上黏痰。对我父母进行人身攻击，又踢又打，让他们跪在地上，在他们的后背上用墨汁写上“反革命”字样，挂上“黑帮”牌子，还给我母亲剃了阴阳头。临走时，隋延堂和赵芝等还起草了一张所谓“勒令”贴在我家门上，上面第一句话就是“叶苍岑，刘云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由此，我家的厄运开始了。

(二) 1966年8月25日下午,北京师大二附中的一伙红卫兵暴徒近10人,(其中有师大历史系教授白寿彝之子白至德的同学李湘斌、刘诚、贾岩燕等)在抄完同宿舍住户白寿彝的家之后路过我家,他们看到“勒令”后就问这家谁是国民党员,同院造反派袁长山、赵芝、关淑英等指着母亲挑唆说:“她是国民党员,她丈夫也是国民党员。”这样,这帮匪徒就冲进我家就又打砸起来。这时几个红卫兵对母亲骂道:“你他妈的老混蛋!”并狠狠地左右开弓抽母亲的嘴巴子,母亲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他们叫道:“要武嘛,文斗不是保护你的!”于是,硬木尺子,带铜扣的武装带更加狠毒地向妈妈抽起来。暴徒们反复地在屋里搜、拿、偷、砸、抢,把家里其余的东西都扔在地上用脚踩,硬木桌椅砸毁,大衣柜也推翻在地,一时家里又是碎片满地,满目狼藉。匪徒们还把剩余的书籍统统堆在院子里焚毁。与此同时,十几条皮带打的妈妈无法忍受,母亲没有办法就往院子里跑就又被拖住打得更加凶残,直打得母亲满地打滚,满脸淌血,惨叫声声,衣服都打飞了,浑身布满血痕,全身肿胀起来。我们上前央求暴徒们停止殴打,回答我们的只是一双双怒目圆睁的眼睛和呼呼作响的皮鞭。母亲也哭着大喊冤枉,但是暴徒们什么也不听,仍然毒打。这时,西长安街派出所民警干部魏志民来了(他是负责本街道治安的片警)我们急忙向他求助,母亲也抱住他的腿哭着央求:“你救我一条命吧,你救我一条命吧。”但魏警官不予理睬,一脚把母亲踢开。于是,暴徒们把母亲用绳子五花大绑捆起来,一边继续毒打,一边从街上截来一辆卡车将她押往相隔一条街(西单石虎胡同)的民族学院附中。

在那些日子里,不论白天黑夜,民院附中的操场上都上演着打人行凶的惨剧,无数受刑人的惨叫声我们附近几条街道都听得到。卡车到了那里后,二附中的暴徒加上民院附中和四十七中的另一伙暴徒刘红路、刘晓康、吴波尔、买里木、赵鹤坤等一齐动手先把我母亲押往一间大堂跪下(该校占据的是庙产),又请院里的造反派在沙发上落座。这时,我母亲的双手被紧紧地捆着,我们兄弟两个在妈妈左右紧紧地扶着她才不至倒下。当时,她被打得已经大量流血,但是随着造反派的又一轮“揭发”,暴徒在妈妈后背上用脚猛踹一脚,母亲惨叫着头就狠狠地撞在水泥地面上,暴徒用脚踢,几十条带铜扣的武装带一起向下打。每当暴徒稍有喘息,关淑英、赵芝等造反派就跳起来“揭发”挑唆,于是惨剧就重演。但无论怎样遭受毒打,妈妈就是不承认强加给她的所谓罪行。每当他们厉声追问母亲是否说过反动话时,妈妈都挣扎着摇摇头用微弱的声音回答:“没说过…。没说过…。”红卫兵逼不出口供,就用皮带更猛烈地抽打,用脚更猛烈地踢。每当妈妈被打昏过去,造反派们就会兴奋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等口号。

由于母亲一直不肯承认暴徒们给她强加在身上的所谓种种罪名,这些暴徒急了,准备下最后的毒手了。暴徒们在学校的操场上集合起来,并押来被他们非法扣押的所谓有问题的一群教职员陪绑。然后把母亲拖到操场上的一个台子上,就一齐抡着皮带,木棍狠打起来。就这样,又是打一阵,逼问一阵,打一阵,逼问一阵,直打得母亲遍体鳞伤,头皮也开裂了,鲜红的血慢慢地沿着被剃的仅有的一点乱发和着碎肉流经她那满沾着尘土的脸颊,滴在那台子上,直到妈妈连惨叫的力量都没有了。这时,暴徒们却欢喜若狂,他们更兴高采烈地跳着脚高呼口号。我们家属就是在这狂喊声中被押了下去。就这样,仅仅几个小时的惨无人道的折磨和毒打,我们的母亲含冤惨死,她老人家死后两眼圆睁,真是死不瞑目啊。

那天傍晚,我们全家都一一被抓到了民院附中,大家含着泪水,在暴徒们呼呼的皮鞭声中,被押送到当地公安派出所去销母亲的户口,我们看着妈妈的户口卡从册子上扯了下来,当民警问及母亲死因时,暴徒们狂喊道:“他妈的,是反革命!”就这样,我们的母亲含冤惨死了,被无端剥夺了生存权,永远离开了人世,离开了我们。

(三) 我们的母亲刘云生于1919年,籍贯河北磁县,从小随着她的妈妈在姥姥家生活。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年仅18岁的她毅然决然地从军参加了抗日斗争，在军旅中担任抗日宣传，文教，救护工作，还经历过台儿庄战役的洗礼。后，曾经做过财会，审计和教师等工作（在北京36中任外语教员，文革前一年因病在家休养）。她一生勤恳坦荡，清白做人，不想竟在光天化日之下遭此厄运。

1984年底，我们曾找过民院附中的校长，他告诉我们母亲死的那天晚上，是他和一些被非法关押的教职员把妈妈的遗体抬上汽车送往火葬场火化的。当时，母亲的尸体被放在一块破门板上，暴徒们一边抽打他们，一边让他们围着母亲的尸体喊“顽固不化，就这下场！”尤其是民院附中的那些少数民族学生，上学都晚，个个正值壮年，直打得他们痛不欲生，因此记忆犹新。据校长回忆说：“那些天这伙暴徒一共惨无人道地以极刑共处死六人，因为其中一人是高干，周恩来办公室还给他们去过电话过问。”几天后，民院附中的红卫兵因此解散。然而，直至今天，有关方面甚至从未给过我们家人任何“说法”或“交代”。

48年过去了，文革这一人类历史上空前严酷的浩劫所带给我们全家、带给成千上万深受文革迫害的中国人的伤痛仍然在流血。

2014年10月整理于北京

~~~~~

## 【拒绝遗忘】

### 雾霾下的文革历史

• 王友琴 •

#### 一、48年后卞仲耘之死登上了大报纸

48年前，1966年8月5日，卞仲耘校长被打死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里。这是北京文革中被打死的第一人。13天后，该校红卫兵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在毛泽东和宋彬彬之间发生了从其名字“彬彬”生发出来的“要武”对话，立即传到全国。在城楼下，一百万红卫兵高举红色塑料面的毛语录本，高呼万岁走过广场。这是中国有史以来人数最多气氛最为狂热的集会之一。会后，暴力和杀戮大规模升级。在此后的20天中，仅在北京就有1,772人被红卫兵打死。这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非战争非军人对非武装普通居民的杀戮之一。杀戮的武器不是枪和刀，而是红卫兵的拳头棍棒和铜头皮带——那也是他们的装束的一部分。杀害过程往往长达数个小时甚至数天，应该被称为虐杀。

对无辜者的生命和中华文明这种野蛮摧残，应该被记录、分析并受到谴责。多年来我写文革历史，一方面尽力收集来自那个时期的文字材料，一方面采访文革经历者。要写出1966年的红卫兵暴力和红八月恐怖，需要广泛而系统的资料收集，不能只凭印象和零散材料。余英时教授把我的研究方法称为利用了孔子说的“文”和“献”两种资料来源。在孔子的书里，“文”和“献”是两个词，分指“文字”和“口述”两种史源，并非我们现在说的“文献”是单指文字材料的一个词。

这不是卞仲耘一个人的惨剧。在同一所学校中，20天后，有一名附近饭馆的女服务员被绑在化学实验室的柱子上被打死，她只有18岁。卞仲耘被打死时50岁。多年来红卫兵们再说卞仲耘死亡是因为她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十八岁的女服务员不会有高血压心脏病吧。

这也不是一所学校的惨剧。在我调查过的北京的十所女子中学里，在1966年8月，共有三名校长和三名教员被打死。他们的名字是：沙坪，韩靖芳，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梁光琪，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孙迪，北京第十女子中学；齐惠芹，北京第四女子中学。在遭受侮辱、殴打和监禁之后“自杀”身亡的人未包括在内。（这里在自杀二字上加了引号，因为这根本不是平常意义上所说的自杀。）在二十多年的调查中，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发现文革中没有发生过暴力迫害的学校，也找不到没有受到暴力迫害的校长。打死卞仲耘校长，仅仅是这场规模巨大的惨剧也是丑剧的开端。

这也不仅仅是校长和教员的惨剧。红卫兵发明了“红五类子女”“黑五类子女”的说法和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一大批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少年实施迫害。例如，1966年8月19日，也就是第一次天安门广场百万红卫兵集会的第二天，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该校数学教师田钦的弟弟田悦，北京106中学的学生。打死田悦的“理由”是“冒充红卫兵”，因为他的父亲是毕业于燕京大学的一名会计，他不属所谓“红五类子弟”。在北京八一学校，不但该校领导和教师被“斗争”，十三岁的六年级小学生习近平也遭到殴打，还被“游街”，因为他的父亲习仲勋那时是“反党集团”成员。今天，他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这也不仅仅是校园惨剧。红卫兵暴力从校园扩大到校外。在北京有近十万人被红卫兵抄家后扫地出门驱逐到农村。当时私人企业早已不存在，结果住在自己的私人房产里的人成为主要打击目标。他们被抄家、毒打，甚至被活活打死，尽管他们已经顺从地交出了房契，尽管当时的宪法写着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通过红卫兵暴力，文革废除了中国人最后的私有不动产。今天，中国的居民住房大多数都属于私人所有。

文革在1966年开始，在1977年正式结束。“特别法庭”在1981年宣布了十六名文革“主犯”受到审判。在1980年代初也开展了“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但是48年来，对卞仲耘之死和对这场红卫兵暴力的报道一直不被准许发表。2000年，我做了一个网页纪念文革受难者。卞仲耘之死是网页上最早的一篇。网页做在芝加哥大学的服务器上。17个月后，文革受难者网页被封锁。现在已经被封锁了12年。2004年，我出版了52万字的《文革受难者》一书（香港，开放杂志社），内有659个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受迫害经过记录。“卞仲耘”是其中最长的一篇。有多名读者告诉我，他们在香港买的《文革受难者》书，回大陆时被海关没收。

事实上，文革受难者书里和网上纪念园里的受难者们，都在文革后得到了“平反”；他们的家人得到了420元钱，作为抚恤金（180元）和丧葬费（240元）。把他们的名字放在一个网页上或者一本书里就遭到封锁禁止，是不可理解也可以理解的事情，取决于什么角度和以什么标准来衡量。一方面，记录一个个已经得到“平反”的人，为什么不可以？另一方面，一个人的受害和千万人的受害，确有质的区别。文革中红卫兵迫害、殴打、杀害校长、老师和其他“牛鬼蛇神”，属于现在说的“群体性杀戮”和“群体性迫害”。这一说法，是学者在描述希特勒的纳粹党在1930—1940年代对犹太人的杀戮和迫害时提出来的。因为传统已有的罪恶名称无法描述那场用种族为理由进行的对几百万人的屠杀，所以需要新的术语。文革用“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名，迫害了如此众多的教育工作者和学生，是一个典型的“群体性杀戮”或者“群体性迫害”。文革制造的给人民带来巨大祸害的社会转型，主要是通过这种群体性迫害来实现的。

为了回避这场迫害的严重性质，就不准谈论这场残酷的迫害的整体，进一步也就不让谈受迫害的个人如卞仲耘——但是我无从知道封锁文革受难者网页的当权者是不是这样推理和考虑的？而且也不知道他们是谁？如何作出封锁的决定？法院的司法判决署有法官的名字，也允许

上诉，对网页的判决却没有程序。我问了北京人。没有人回答，有人甚至认为这问题提得奇怪，似乎历史写作就像天气阴晴雨雪，只有接受，不必问情由。

从2004年《文革受难者》出版，十年过去了。对受难者网页和书的封锁依旧。然而，十年后，2014年，戏剧性的变化发生了。《文革受难者》书名在中国大陆的大型报纸上出现了。不过，不幸是以负面的方式被提到。2014年3月13日，中国发行最广的刊物之一《南方周末》发表了整整四版长的文章，主要内容是对宋彬彬的专访。在详细描述了宋彬彬怎么在天安门上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之后，提到了我的名字和《文革受难者》书名。《南方周末》没有介绍书的内容也没有说明出版社和出版地点，也不加论证，就声称这本书“歪曲事实”。

“歪曲”了什么事？他们认为的“事实”是什么？他们没有说。对一本52万字长的、在大量调查访谈基础上写成的书，用三言两语给报纸读者灌输一个否定性结论，这种武断让人吃惊。报道并未指出这本书的哪一页哪一段那一行不是事实，就作此断言，不是一个大报纸应有的文风。此外，指控一本读者还未有机会阅读的书“歪曲事实”也显得相当奇怪。

## 二．向受难者还是向宋彬彬道歉？

关于卞仲耘之死的看法分歧，至少是在两个层面的。一个是在事实和逻辑层面的，一个是在判断所依据的道德原则层面的。在后一方面，各方有不同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评判，对文革有不同的看法可以各自表达。但是在前一方面，可以也应该辨清。

不但对卞仲耘案件，《南方周末》报道对《文革受难者》书中写到的另外两名受难者张放和李文波做了不合事实的描述。该报道声称“不少受难者本身也选择了遗忘”。他们没有提受难者张放（北京二龙路学校英语教员）被剪掉头发和丢在坑里半活埋的悲惨遭遇，却说张放的女儿烧了关于张放受迫害的案卷，不让弟弟知道。事实正相反。张放老师的家人不但从来没有烧过案卷，而且收集保留了有关资料，并为她修了坟墓立了石碑。张老师的孩子看到了这篇报道立即给我写信，传来了他们全家写好的想要发表而几十年来无法发表的纪念张放老师的文章。（见本刊zk1404c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张放”附录——编注）

《文革受难者》写到，1966年8月25日，第十五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到广渠门内大街121号居民李文波家抄家。李文波住的房子是他自己的，以前有过小产业。红卫兵指控李文波用菜刀砍了她们（其实另有不同说法），当场把李文波打死。李文波的妻子刘文秀两周后被判处死刑枪毙。《南方周末》文章把李文波说成是“杀人高峰出现的缘由”。把受难者说成是大规模虐杀的原因，这完全是本末倒置。在《文革受难者》书中已经写出，在李文波被打死的前一天，北京单日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就已经达到了44人。

我和《南方周末》联络，要求让我说明事实。我的意思很明确：你们可以对红卫兵暴力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但是不能编造事实。他们回答说，关于这件事情，中宣部已经作了批示，不让他们再发表任何有关文章。也就是说，宋彬彬和其“团队”（一些人如此自称）发表完长篇大论以后，受难者家人和我不被准许发言。至于哪些部长作了批示以及批示了什么，他们不肯告诉。人们只能猜测：这是意味着从前不准发表文章谈论文革的政策变成了只让单方面说话？还是在单方面说够以后，又要回到不准谈论？

听说写报道的《南方周末》记者冯翔在文革后出生，我担心他因年轻而不了解历史细节，就找到了号码给他打了电话。我说，他在报道中描写谢富治和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商量给毛泽东献袖章，口气中把谢富治当作一个一般的大干部；他是否知道谢富治在文革后被“特别法庭”定为对文革负有重大罪责的16名“主犯”之一。谢富治患癌症死于毛泽东之前，否则1

1976年10月抓的就不是“四人帮”而是“五人帮”。冯翔反问：“主犯又怎么啦？”然后他质问我：“你为什么还不向宋彬彬道歉？”

这是第一次有人直接要我向宋彬彬道歉。我有点惊讶，不过也不太惊讶。多年来宋彬彬和她的“团队”一直在重复表达这样的意思，只是没有说得那么直白。《南方周末》文章也通过某位受访者之口不指名地做了这样的要求。一本题为《故事不是历史》的书已经出版，意思是我写的是“故事”不是“历史”。我和冯翔的电话谈话未能继续。这位记者并无兴趣对他文章中的事实、逻辑等问题作讨论。

这就是卞仲耘之死在48年后终于登上媒体的故事。卞仲耘之死，包括1966年8月的其他红卫兵暴力受难者之死，他们的被害过程，当时在大庭广众和光天化日之中发生（当然也有在黑暗中秘密发生的），既不被当作秘密，也并不复杂。被害者是群体性的。施暴者也是群体性的。对暴力迫害的法律上和道德上判断，更是清楚的。中国是文明古国，从来没有这样的由青年学生大批打人杀人的传统或习俗。除了文革理论，找不到任何把卞仲耘之死合理化的“理由”。但是，卞仲耘之死硬是被排除在历史记载之外几十年。在大陆印行的几部文革通史，都没有提到卞仲耘之死和“红八月”杀戮。假使没有《文革受难者》，卞仲耘之死和其他大批普通受难者的死亡，全无报告，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连《南方周末》这篇报道也全不需要费心制造。48年之后，卞仲耘之死终于登上大型媒体时，四大版的文章，由红卫兵担任叙述主角，全文的目标是要求揭示和记录了卞仲耘之死的我向宋彬彬道歉。

这不给人一种超现实的荒诞感觉吗？这不仅仅是在冒犯一本书或者一个作者，这是在挑畔千千万万文革经历者的智商和道德准则。因为中宣部长们的“批示”，这个长篇报道（应该说是这些年来关于文革的一个超长的报道）发表之后，在媒体上没有出现争论和异议。这种情形使人想到，近两年来人们开始关注空气污染，“雾霾”成为人人知道的词语，不像从前，很多人不认识“霾”字，不知道该念“li”还是“mai”。其实，空气污染存在已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现在北京的天气预报已经增加了“空气质量”一项（在阴晴雨和温度等之外）。可是就在不久以前，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在其网页上报告PM2.5（即能直接进入肺泡的微小粒子）浓度还被认为是一种阴谋或者捣乱。现在，在文革历史的写作中，思想的雾霾也已经落下。暴力迫害的规模和组织性在被否认，暴力杀戮的起因在被否认，说出历史真相的作者遭到攻击。在雾霾造成的昏暗中，事实与谎言，罪恶与正义，善与恶的本来相当明显的界线，被混淆甚至倒置。而且，这种思想雾霾已经和正在伤害社会道德的肺泡。

三．既然习近平也是“红八月”受害者，为什么红卫兵暴行不准报道不准否定？

曾有四位退休长者约我见面，还请我在很贵的饭馆吃饭。这让我很不好意思。他们说，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同班同学。他们还告诉我，《文革受难者》书中写的两名受难者张辅仁和靳正宇，是他们的大学同班同学。在1966年“红八月”中，他们班还有一名同学被害死。她的名字是廉秀文。廉秀文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地安门中学教书。她还没有结婚，住在父母家中。父亲从前是小商人。红卫兵抄家，命令他们交出隐藏的枪支，他们交不出来。红卫兵说不交出枪来就在下午打死他们。廉秀文在中午跳楼身亡。

廉秀文老师是《文革受难者》里没有写进的受难者。如我在书的扉页上表达过的意思——这本书远远没有记录全文革中发生的迫害和杀戮惨剧，因此我对死者抱歉，并请求生者协助做进一步调查。他们说的张辅仁，是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教师，1966年8月19日在学校中和另一名老师张福臻一起被打死。那是宋彬彬在天安门上给毛泽东献红袖章的第二天。靳正宇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语文老师。在1966年8月25日被该校红卫兵打死。同日还有该校负责人姜培良和一名高二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樊希曼也在学校中被打死。

我写《文革受难者》的时候，只知道张辅仁和靳正宇两位老师死得非常悲惨，并不知道他们是大学同班同学。现在知道在北京师范大学一个三十来人的班里，在1966年8月，有两人被打死，一人被逼“自杀”。教员的这种死亡密度，让我再次震惊与悲愤。我感谢四位老师的指教。我敬佩他们。他们的正义感和责任心不因他们年老而消退，而是变得更加深沉有力。他们自费出版了书，写出历史事实和对暴行的谴责。他们和作为新闻公器《南方周末》那篇关于红卫兵暴力报道的轻浮和偏向成为鲜明对比。

四位老师中，陈老师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八一学校。像其他中学一样，这个学校在文革中发生暴力迫害，包括毒打和“自杀”。陈老师说，文革开始时，习近平在她教的六年级语文课上。习近平的父亲当时被关，他是所谓“黑五类子女”。他遭到殴打，还有一次被“游街”。习近平住校，有一天问陈老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指打人和暴力迫害）。她说，她当时没有能很好回答这个六年级小学生提出的问题（当时谁又能呢？虽然回答问题是老师的职责）。她知道他很痛苦，但是他很沉稳，不参加作坏事，没有去“造反”和打砸抢，没有害别人。

我做过大量的文革访谈，从不泄露消息来源。这是重要的原则。这里我写到陈老师，因为她和我谈过之后，当国际记者请求采访，她也爽快地答应，并且留下了录音，让记者采用。陈老师谈了1966年8月她的三名大学同班同学也是中学教员死于红卫兵暴力，也谈了习近平遭遇的欺负和侮辱。她为历史作见证。她从道义原则上看待这件事情：应该揭露和反对这种对一个小学六年级的13岁少年的身体和心理的摧残，并不是因为他现在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我曾听到一种说法：高层权力人物不会喜欢别人说他们以前的倒霉事情，普通人应该回避说这类事情以免招来麻烦。我不知道是否今天的高层领导人都这样想。但是陈老师并无这样的顾虑。她陈述了历史事实，阐明了她的价值原则，也表达了她的期待。她当然已经不年轻，但是外貌端庄，言辞清晰，有思想，有勇气。她能扫除对那一代人的过分谨慎、胆小窝囊的刻板印象。（即使有这样的情况，也应该说是长期的精神压迫所致。想想他们经历了什么吧。一个班的大学生，毕业六年之后，一个月间就有三人在红卫兵暴力下丧生，还不准说。）她比很多出生于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的文革经历者在精神和道德上年轻和正直。因此我认为应该把她的故事写出来和读者分享。

《南方周末》报道引用了多名受访者的话，为宋彬彬帮腔，显得人多势众、蔚然成一阵营的样子。在《南方周末》报道之后，一位知名作家向很多人打听：这篇报道有什么背景？有什么大人物在幕后？我理解这种做法，虽然我认为判断应该首先来自历史和道义的角度。我甚至也同情，为什么几个在两年前跟我说他们是在宋彬彬和我之间的“第三边”的人，在《南方周末》的报道中已经站到宋彬彬一边。当媒体控制作家的发表的时候，作家为了发表，就得打探媒体的某种行动的权力背景。我好奇这一打探的结果。他最后打听到了什么？《南方周末》报道是来自习近平的支持？只是宣传主管部门的决定？还是仅仅是宋彬彬和她的“团队”的意向？

既然当今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也曾是红卫兵暴力的受害者，那么，为什么关于红卫兵暴力的报告和分析，在48年之后还被禁止，而且遭到无理攻击？这是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可以相信，假使1966年时北京八一学校殴打侮辱了习近平的人知道47年后他会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一定对他网开一面，虽然他们会照样迫害别的人。可以预料，《南方周末》和写批示禁止反驳宋彬彬的中宣部部长们（《南方周末》人说是三位），也不敢直说少年习近平所受的迫害是虚构的“故事”。但是，这些掌握媒体的人仍然全面禁止报告红卫兵暴行的做法。实际上，在48年之后，在“逐渐改变”和“谨慎稳妥”都不再能成为讳说文革历史的“理由”之后，这种做法是在肯定文革对千千万万父母有“问题”的青少年人的迫害（且不论他们的父

母是否真有“问题”)，是在肯定对教育工作者的大规模的残酷迫害，是在肯定把住在自己拥有的房屋里的人打死的财产政策。对红卫兵暴行的记载和评价实际上关乎社会经济和法律制度的重大原则：是否宪法所说的保护公民人身安全和私有财产只是一纸空文？是否可以不经法律程序就关人杀人？是否可以用暴力没收私人财产？

1966年夏天已经让我们看到了文革理论的恐怖实践。关于红卫兵暴行写作的限制和单边禁令，显然不仅事关历史写作，也事关亿万人的现实和将来。

#### 四．雾霾和蓝天之间的选择

2010年春天，宋彬彬和她的“团队”开始了他们新一轮的否认行动。他们在电子刊物上发表了很长的文章，其中部分内容发表在那一年8月的《炎黄春秋》杂志上。事后，《炎黄春秋》编辑问我是否做争论，于是我在他们的10月号上发表了《恐怖的红八月》一文。文中列出了1966年在北京死于红卫兵暴力的87个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工作单位或者住址。(因为纸面刊物篇幅限制，外省部分没有能写入。)我认为，全面介绍红八月的大规模暴力和死亡，才能说清楚卞仲耘之死是怎么发生的以及发生的原因。而宋彬彬和其“团队”的文章一直回避着红卫兵暴力的总图景。也是在那年10月，我还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篇三千字的短文，题为《“开了个好头”：红卫兵道歉》，写的是我在调查采访中看到北京外国语学校申小珂等红卫兵给程璧老师的道歉信。我认为，这些红卫兵道歉不但是他们表达心声，而且，一方面使得未经历文革的年轻人了解文革历史，另一方面给社会带来了一股道德的清新空气——他们是自愿道歉的，而不是出于实用需要或外界强迫，所以是出自个人道德。实际地说，红卫兵道歉也是一种可行的正视历史及和解社会的方法。

这篇写红卫兵道歉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反响，多篇相关报道很快跟进发表。接着，道歉之声在2011年薄熙来的声势浩大的“唱红歌”中沉寂。(薄熙来在更早的时候曾经请我采访过的对红卫兵暴行作过调查的老师免费旅游并赠予礼物令其闭嘴。)然而，在2013年有更多红卫兵站出来在平面媒体或者网路上道歉。红卫兵道歉在2013年底因为陈小鲁道歉而达到高潮。陈小鲁的父亲是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他本人是文革中著名的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负责人，北京第八中学的文革委员会主任。他的身份使得他的道歉更有冲击力，甚至成为国际新闻。几家国际大媒体不约而同来电话问我的看法，显然他们把这几例红卫兵道歉看成了中国对文革态度的变化和进步。

直到2013年12月31日，宋彬彬的“团队”还在发表文章指控卞仲耘丈夫曾出示的一份当年的调查记录是伪造的。他们在一月初突然改变了方向，也加入了“道歉”之流。当人们还在议论她的道歉究竟是否真诚等等，他们又一个急转身，在《南方周末》上要别人向他们道歉，包括活着的人和已经死亡的人：上文已经说到，一名被红卫兵打死的小业主李文波，在文中被他们说成是红卫兵大规模杀戮的原因。

大报纸的四大版是有威力的。《南方周末》不准在他们报上发表不同意见。别的媒体也不被准许发表有关文章，已经准备好的文稿只能扔掉。一些传言在私下流动。有几个人，有中央级大媒体的中层负责人，有消息灵通的文化人，都说一本准备了几年要在5月发表的题为《我们忏悔》的书已经被禁了，印好的书已经打成纸浆了，等等。那本书的内容是一群作者忏悔他们在文革中当红卫兵做了的事情。后来我了解到书还在，不过确实阻碍重重。但实际上这种传言的产生和流传，已经表现了人们的沮丧和压抑。这样的文化气氛多么令人难受！

北京的一位编辑说：这里没有人研究文革，因为写了文章不能发表。不能发表就提不了职称。所以，没有人写文革。他说得直截了当，清楚明白，简直让人很难给他反应：同情？失望？



还是显得一样愤世嫉俗玩世不恭？

48年过去了。48年是一个什么概念？如果上大学，可以毕业12次。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在48年里学完12个不同的专业，变成一个“全才”。在卞仲耘被打死和习近平被打48年之后，应该是人们不但能知晓历史事实，而且能分析发生的原因，知道防止的办法，而且应在探索与实践与文革截然不同的生活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然而，《南方周末》的报道给出的是令人丧气的信息：在48年之后，事实仍然不容报道，受害者方面仍然无权说话，开倒车甚至倒过了1981年特别法庭对文革的那场不完全的审判。连道歉和忏悔刚刚开始冒头的良性行为，都因此而被压下了。物质的雾霾不但挡住了人们的视线，让人看不清世界，同时雾霾被吸入肺部，也损害人们的肌体的健康。精神的雾霾也是这样，让人们看不清历史，也损害着人们道德和理性方面的健康。当人们已经意识到物质的雾霾并且想要设法解决的时候，这种精神的雾霾呢？

在卞仲耘校长被打死48周年纪念日，我去看望了王晶尧先生。他已经满了93岁。他的妻子卞仲耘被打死的时候，他47岁。他在妻子被打死后，立即买了一个照相机拍摄了当时的场景。他也始终保留着妻子被害时的血衣和被打得金属表链都被撕裂的手表等等。他当然已经苍老，但是健康好于多数他的同龄人。他带上眼镜，看了一段我去年发表的长篇文章《文革斗争会》。卞仲耘就是在暴力斗争会上被打死的。我坐在他对面望着他。在隔开我们的桌子的上方，是卞仲耘和他的照片，那时他们不到五十岁。我想到，这位老人的生命中有一半，是在妻子被打死的阴影中。他们一家经历了悲惨的文革迫害，但是他们也从来没有放弃。他尽了他的努力来抗争。他们的坚持，使得即使48年之后，也无人能绕过卞仲耘之死的历史事实。感谢王晶尧老人，也感谢教过小学六年级生习近平的陈老师，他们对历史的坚守为我们带来一片道德的蓝天。

关于红卫兵暴力，新的情况发生在9月19日。在首都师范大学附中的教师节庆祝会上，1966年的高二学生马晓力讲话反省自己并带领在场的老学生和年轻学生向1966年8月在校中被打死的老师喻瑞芬和学生田悦默哀一分钟。被《南方周末》阻断半年的正气正在回归。喻瑞芬和田悦，都是《文革受难者》书中的人物。在这本书在香港出版十年以后，喻瑞芬和田悦的名字终于回到了他们遇害的地点。出版了这本书的《开放》杂志编辑也是反抗雾霾带来蓝天的人之一。经历了北京的雾霾的人应该特别知道蓝天的宝贵。而且，雾霾不是自然的天气现象，不是“古已有之”的，是人为造成的。蓝天也不会自然而然为爱蓝天的人永不改变。清除雾霾和保持蓝天，需要抗争、努力和坚持。

写于2014年8—9月

~~~~~

## 【往事非烟】

### 不堪回首的安徽

• 朱柏生 •

从1966年夏季“文革”爆发，到1969年底中国科技大学南迁安徽，这三年半时间内我虽然经历了“文革”的种种疾风暴雨，内心有过许多疑惑、愤懑和抗议。但是，由于自己没有直接参与派系斗争，大多数时光又耗费在“专案”当中，脱离班级集体，受到军管会信任。所以，我的种种不合时宜的思想基本上没有暴露，仅限于写读书笔记。另一方面，我的一些正面行为，如反对派性，促进两派大联合，反对逼供信，专案工作中讲究政策，特别是为防止“钴”放射性污染作出了贡献，因此，在这期间我不但没有被怀疑、被审查，反而还在1968年的

国庆节，当选为首都观礼代表。

1969年12月26日，中科大根据中央的决定，从北京搬迁到安徽省安庆市，中科大被安置在安庆地委党校，这就是中科大的新校址，校园面积大概不超过20亩，主要校舍就是一座四层高的教学楼，我们到达时正值寒冬，安庆没有暖气，学生们就睡在教室的水泥地板上。铺上稻草，几十人挤在一间教室，就地而卧，真的是饥寒交迫。

我的第一次失言，也是影响我一生的事，就发生在到安庆四天后的12月30日晚上。我一直有早睡早起的习惯，那天晚上，大概还不到10点，我就睡着了，睡的正香时，被本班同学激烈的争辩声音吵醒了，我的心情极其烦躁，情绪处于失控状态。

当时本班同学有的躺着，有的坐着，争论的十分激烈，争论的焦点是：“究竟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顾大立同学认为，如何评价“文革”，要看“文革”是不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现在评价为时尚早；另一位同学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伟大，不能只看生产力是否发展，关键是“文革”打倒了刘少奇，挖掉了修正主义总根子，从此以后，中国就可以保证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了……。顾大立说：现在不少工厂停工，安庆大街上就有很多讨饭的，难道说这就是革命的目的吗？还是要看生产力是不是发展了……。

他们的争论激起我内心多年深藏不露的愤懑，我的情绪失控了、爆发了，我喊叫道：“吵什么呀！什么挖掉了修正主义总根子，什么中国再也不会出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物了？我看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现在就有！”那位同学责问我：“你说说，他是谁？”我激动地说：“现在不是有人说朱总司令是黑司令、是军阀、是草包司令吗？说朱总司令离开毛主席，一天的仗也打不了吗？说朱总司令沾着茅坑不拉屎吗？”我责问道：“如果朱总司令是草包、是黑司令，还怎么说人民军队是光荣伟大的？毛主席这么伟大，又为什么给自己找了个草包司令呢？”我说：“我看说这种话的人就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那位同学吼道：“你这是攻击林副统帅！”我说：“这话是你说的，我没听说林副统帅攻击过朱总司令”。那位同学责问：“就算有人说了朱德是草包、是黑司令，你敢怎么样？”我说：“我很后悔，去年参加国庆观礼，没有找把枪，毙了他，如果我有第二次机会，我会亲手杀了这个野心家，为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为了共产主义事业，我情愿用我的命换他的命！”

这次严重的失态，把我们班当时睡在同一地铺上的二三十名男生吓坏了。大家纷纷急着说：“都不准胡说八道，都给我睡觉！”这时，我也清醒过来了，想到了问题的严重，因为我们班所有同学都知道林彪在1966年5月份政治局会议上攻击朱德的这个讲话。大多数同学和我一样，十分痛恨林彪，但是，谁也不会公开讲出来。我这样公开讲出来，可是犯了死罪啊！那一夜，我几乎再也睡不着了。

那天晚上不理智的争论发生后，我们班再也没有人提起这件事，似乎风平浪静了。但是，在接下来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到了1970年3月，我们系还是有人揭发了我的这一严重“罪行”。那时，我们系的全体师生都被安排到安徽省白湖劳改农场劳动和搞运动，我被抽调参加在合肥工业大学举办的“彻底揭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阶级斗争盖子学习班”。在有人揭发了我的问题后，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人就搜查了我留在白湖的两个纸箱子，发现了我在“文革”当中书写的约40万字左右的“反动笔记”，我的问题就这样暴露出来了。

我的问题的暴露，并引起当权者——工、军宣传队的注意，还有一件事，就是我参与了“合肥之行”。这是怎么回事呢？1969年底，中科大从北京搬到安徽，是非常仓促的，并不像后来安徽吹嘘的那样，说什么他们省历来重视教育，重视人才；也不像河南省后来常常提起的“失去了一次引进高水平大学的良机”。说实在的，在那个年代，毛泽东都说了关于大学办不办的话，

还有哪个当权者对大学感兴趣呢？关于中科大的搬迁，据说，1969年10月，中央决定中科大等首都大学必须外迁，当年北京一共有62所高校，要搬走一半。开始中央要中科大搬到江西共青城，中科大考察后，担心血吸虫病，不愿去江西；提出去四川绵阳，中央又认为清华、北大已向绵阳疏散，担心高校过于集中而不允许；中科大又提出迁到河南，中央同意，让中科大与河南协商，中科大选了郑州市东郊二里岗，河南省委不同意，中科大又提出可以去许昌或新乡，河南也不同意。河南建议中科大去南阳的新野县或唐河县，中科大考察后，认为一是不通火车，二是电力严重不足，根本不能满足要求，于是就放弃了去河南的想法。时间紧迫，中科大与中科院联合向国务院业务组领导李先念汇报，请求安排适当的去处。正在汇报时，李先念的老部下李德生进来了，他时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十二军军长、政治局候补委员，李先念随口说：“小李，中科大没有地方搬迁，去你那里怎么样？”李德生答：“行啊！”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事实上，中科大搬到安徽，安徽省一点准备都没有。中科大当时有近三千名师生，安徽让我们去安庆，安庆地委只给了一所地委党校的院子，就20亩地，一座楼。中科大的师生历来以中国的“麻省”、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创建的学校、“两弹一星”的摇篮为自豪。到了安徽，眼看学校面临解散的命运，岂能甘心？一过元旦，师生们吃饭都成了问题。我们心急如焚，纷纷跑到地革委反映，当地的负责人说：“从来没有人让我们给你们学校拨款，我们也没有考虑给你们钱！”我们问：“那么，中科大今后怎么办？还办不办学啦？”他们说：“那很好办，安徽的大江南北、淮河两岸都是你们科大办学的好去处，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到农村去，到工矿去，走‘五、七’道路，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这就是你们的出路！”我们听了之后，全校马上炸开了锅，这不是明摆着骗人吗？作为培养“两弹一星”人才的高等学府就这样完蛋了吗？这时，一种强烈的为国家、为民族、为未来的使命感促使我们不顾一切地豁出去了。

1970年1月5日，几位在中科大有较大影响的同学，一天数次跑到安庆邮局给中科院的刘西尧、国防工办的张震、国防科工委的刘华清等首长发电报，要求他们火速乘直升飞机到安庆来，听取我们的汇报，挽救中科大。5号晚上，中科院答复：“首长6日乘直升飞机到安庆，听取中科大师生的意见。”可是，到了6号，中央有关单位电话通知：因北京连续三天风沙浓雾，飞机无法起飞，三首长决定7日乘火车到合肥解决科大的问题。6号晚，我们这批活跃分子讨论认为：中央首长若是先到合肥，必然先见安徽的领导，安徽的领导不可能反映真实情况，如果中央首长偏听偏信，一旦做出解散中科大的决定，情况就无法挽回了。于是，我们决定：立即组织部分骨干连夜赶到合肥，抢在安徽省委之前，接回中央首长，让中央首长先听我们的汇报。当晚十二点，我们叫起已经睡觉的北京工宣队的白指挥（此人是党的“九大”代表，北京造纸厂的工人），要求他给我们派车，开始他不同意，学生们就跟他争吵，骂他是“工贼”，白指挥不得已同意派车，夜里两点，我们一行29人乘上校车兴高采烈地从安庆出发向合肥进发了。

我们的头脑太热太简单了，以为我们胜利了。就在我们出发不久，白指挥就将我们的行动向北京、向安徽省革委报告了，并断定我们是去合肥“绑架中央首长”。我们还蒙在鼓里，上午到了合肥火车站，顾不上吃饭休息，商量如何向中央首长汇报，如何以情感人，如何争取中央的支持……。我们在火车站焦急地等着，按时刻表，中央首长乘坐的列车应当在下午四点到站，可是，等啊等啊，快到六点了，也没有动静，却见火车站里来了许多荷枪实弹的士兵，士兵老是盯着我们这二十来个学生，此时，我们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直到晚上六点半，安徽省革委会办公厅派人来找我们说：“你们是中科大的学生吧？天不早了，省革委领导请你们到省委招待所去，有事可以慢慢谈嘛！”我们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商量后认为：“来者不善，合肥不是久留之地。”于是，就骗省革委办公厅的人说：“马上就去，”等我们的人一到齐，就立即启动车，飞驰回安庆了。

我们回到安庆后，也没有太在意，随即就回家过春节了。刚过完节，就收到了中科大要求我“火速回安庆”的电报。我们回安庆后，陆续知道了详情。原来，在我们去合肥的路上，北京工军宣队就向省革委和中央谎报了我们要绑架中央首长的情报，于是安徽方面就派军队包围了机场和火车站，北京方面经周总理亲自批示，责成铁道部，让乘坐刘西尧等三位首长的火车在离合肥还有百余里的小站紧急停车，车上广播通知“首长下车”，刘西尧等不知就里，没有下车，直到士兵们上车搜寻，才把三位首长请下车，并由安徽省革委的车队接到了合肥。

我们的“合肥之行”没有接到中央首长，但也引起了中央对中科大的关注。周总理亲自批示：安庆不是中科大办学的合适地方，应当在合肥选址。安徽革委会就我们的“合肥之行”也做出了三条决定：一是，中科大学生企图绑架中央首长是“反革命”行为；二是，立即解散合肥师范学院，校址让给中科大；三是，要求中科大半年之内完成搬迁。

过完春节，返校后，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安徽派来了工军宣队，他们把参与“合肥之行”的同学看成是危险分子，称我们是“小28个半”，（文革中，康生把追随王明的中共早期留苏人员定为“28个半”反党集团。我们参与合肥之行的主要是科大三系，四系的同学共29人，其中三系的一位周姓同学是合肥人，他想乘坐便车回家，算半个骨干。这样，我们参与合肥之行的也正好是二十八个半）。后来，在搞清楚我们没有绑架中央首长的企图后，对此也没有过多深究，只是大会小会作了几次泛泛的批判，但是，我已经被安徽的工军宣队注意上了。

1970年2月下旬开始，中科大从安庆搬到了合肥，各系同学分别被安排到白湖农场、淮南煤矿、寿县农村、铜陵铜矿等地劳动，并开始了“一打三反”运动。通过“合肥之行”，安徽省革委会认为中科大问题十分严重，决定重点整治。于是由当时的省革委会副主任李东林挂帅，把中科大的原当权派，革委会的头头，两派骨干，活跃分子等都集中到合肥工大，举办“揭开中科大文革阶级斗争盖子”的学习班，这个学习班一共42人，包括原党委书记刘达等30人算是有问题的，需要交待的；另外像我这样的12名师生是工军宣队认为了解情况的“左派”，是依靠对象。

这个学习班从一开始就“火药味十足”，不准参会人员交谈、串联，要求有问题的人“竹筒倒豆子，彻底交代”。学习班刚进行半个月，就发生了原保卫处干部李恒昌上吊自杀的事件。开始，我还比较轻松，没有涉及我的什么事，我也不是“坏头头”。可是4月初的一天中午，正在吃午饭，送来了一份报纸，我看到报纸上用一个整版揭发某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标题是：“敌人磨刀霍霍，要杀我们的头，我们该怎么办？——格杀勿论”！大致浏览了一下内容，我顿时懵了，通篇写的都是我“读书笔记”上的内容摘抄，还专门揭露了我恶毒攻击林彪是赫鲁晓夫式人物，并要杀害“敬爱的林副统帅”的罪行。那天中午，我没有吃多少饭，就回宿舍了，中午也没有休息，其实，这时已经有人看管我了，下午我就被关到了合肥工大的一座二层小楼上去了，这一关就是四个多月，我被隔离审查了。

我从这天起，就失去了自由，吃饭由看管我的人打饭，上厕所当兵的看管，睡觉有看管的人陪睡，并反锁上门。对于这样的遭遇，应当说，我是有思想准备的，三、四年来，内心也曾多次发誓：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为了中国人民，随时准备流血牺牲。我被关押的前10天，拒绝写任何交待材料，我的答复是：“现在思想很乱，等我安静下来，理出个头绪”。四月中旬，我听说，中科大有近10位同学因受不了迫害，纷纷跳楼或卧轨自杀了，多数是我很熟悉的同学，尤其是六系的一位同学，让火车拦腰截断，死状十分悲惨，死后，淮南煤矿的造反派还把他的两截尸体拉到一起，组织学生和工人到现场开批斗会……，那个疯狂的年代，还有什么灭绝人性的事情干不出来呢？

四月二十日之前，我经过再三考虑，认定自己必死无疑，心想，豁出去算了，死也要死得

有骨气。于是，我简明扼要地写了第一份交待材料，大概有四页纸。我说，我的全部“反动思想”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我不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我认为中央存在着三个司令部。我拥护毛主席为首，周总理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刘邓司令部当前已经是次要矛盾；而以林彪为首，江青为副的司令部，是一个类似于苏联托洛茨基匪帮的极左的反革命集团，我认为这个集团的主要首领是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我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事件，对中央的决策都是按照这个思路来分析的……。

我把这份材料交出去之后的当晚，安徽省革委会副主任、中科大的工、军宣队总队长李东林就找我谈话了，他不是谈话，是审讯、谩骂和恐吓。他把我写的材料甩到我的脸上，大喊大叫：“反动至极”、“罪大恶极”、“千刀万剐”、“枪毙你十次都不解恨……”。我也被惹火了，我想，反正活不成了，死也决不当狗熊！我把墨水瓶摔到地上，泼了一地墨水，我说：“你凭什么杀我？我没有反动行动！甚至没有多少反动言论，我是思想罪，在世界上思想是不能定罪的，法西斯的南非当局尚且没有枪毙曼德拉，你们凭什么枪毙我！枪毙我，只能证明你们比法西斯还法西斯……。之后的几天，我不写交待了，我的理由是“李东林不容许我实事求是地交待！”我开始认真地考虑自杀的途径和方法。

当时，我兜里还有10多元春节从家里带来的钱，看管我的人，夜里睡的很死，我有机会逃出去，我不想让他们侮辱我的尸体，我也有落叶归根的想法，希望死了也要埋在家乡，埋在母亲身边，还想告诉家人，我为什么会被整死。于是，我想了一个死法：夜里逃走后，坐长途汽车回家，在离我家三、四百米远的范公堤公路上下车，让汽车轧死，我留下遗嘱，我想，家里人会去收尸的，我起码可以葬在母亲的身边了……。这个想法在那几天一直在脑海里萦绕。我原本打算在4月25日之前，将这一计划付诸实现，真的，那时，我绝望到了极点。

接下来，我做了个奇怪的梦，一下子改变了我的想法，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事情是这样的：1970年4月24日中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广播里反复播送着从太空传回来的“东方红”乐曲。被关押的我，同样心潮起伏，热血沸腾。一方面，我为我们祖国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中科大在其中做出的贡献而无比自豪；另一方面，我为我自己即将离开这个世界，走向永远的黑夜感到无比的悲伤。那天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欲哭无泪，欲睡不能。

大约清晨四点多钟，迷糊过去了，大概也就睡着了十几分钟吧，就在这十几分钟里，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梦见自己已经56岁了，身体长的胖胖的、很结实（当时我很瘦，体重只有110斤），红光满面，周围的人都很尊敬我，热情友好地同我打招呼……。刹那间，我惊醒了，真是百感交集。我醒后，直到天亮，再也睡不着了。我开始认真地考虑：我为什么会落到今天的下场？我错了吗？在我的脑海里，我把恩格斯与巴枯宁的争论，列宁与普列汉诺夫的争论，斯大林与布哈林的争论，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争论……像过电影一样地进行回放；我把自己曾经历的“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文革”的种种怪异事件一一展现。我平生第一次大胆地向自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难道毛主席真的洞察一切吗？难道他的话真的一句顶一万句吗？难道他就不会犯错吗？我又联想到“文革”中搞专案，接触了那么多的高级干部、甚至是将军，元帅，副总理，许多人都隐隐地流露出对林彪、江青等“文革”红人的不屑，和广大工人、农民对无休止运动的不满，我相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这时，我头脑里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推理：林彪、江青等人是那样地不得人心，却为什么还能那么骄横不可一世呢？不就是因为有毛主席的支持吗？毛主席明明犯了许多错误，却为什么还能让全国人民把他像神一样地尊起来呢？不就是因为传统的迷信和专制吗？由此，我大胆地推演，毛主席去世之后会怎样呢？我断定：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是容不得林彪、中央文革一帮人横行霸道的，到那时，也许就会“天翻地覆慨而慷”了。我这么一想，近一个月的悲观失望，反复考虑的自杀念头一下子动摇了。我是1943年出生的，等到我56岁时，就到本世

纪末了，那时的中国会是个什么样子啊！我真的还会有未来吗？我计算着：毛主席已经77岁了，他老人家活到90岁，我才30多岁；他老人家活到100岁，我也才40多岁，他老人家去世之后，林彪、江青等人是一定会完蛋的，我们这些人是一定会翻身的，民主正义是不可抗拒的！我们这一代人还会有美好的未来。就在这一天清晨，我下定了决心：我不自杀，我要争取生的机会，我相信一定会有美好的未来！

我做的这个奇怪的梦，后来还真的灵验了，等到我56岁时，已经是1999年了，这时的我是幸福的。我已被从开封调到省会郑州，任河南纺专校长。这一年，我分到了140平方米的住房；这一年，我被评上了教授；这一年，我喜添了个孙女，当上了爷爷；也许这就是冥冥之托吧。

许多事情都有巧合，就在我交第一份“交代材料”，被安徽省的李东林骂为“杀你10次都不解恨”的前后，在北京的中央党校，发现了一份“反动传单”，落款是：中共（马列）中央委员会，声称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朱德，总书记是陈毅，常委有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人，我写的那些观点与这份传单相同或相近。李东林把我的材料汇报上去之后，我这个穷学生一下子就上升为安徽省的重大政治犯啦！李东林亲自抓我的专案，工、军宣队的人曾经很可笑地问我：“你和朱德有啥关系？”我说：“除了我们都姓朱，别的没有什么关系”。

由于在交第一份材料时，与李东林发生过激烈冲突，所以，在做了那个奇怪的梦之后，我就反复考虑，在毛主席百年之后，我如何才能翻案。我决定：一方面，我不能硬顶；另一方面，我也不能一味地投其所好，这会为以后平反埋下祸根的。为了慎重，一段时间内，我不急于写交待，安徽省专案组为了报功，就迫不及待地希望从我身上捞到油水，大约是四月三十日傍晚，军宣队的石政委（他是十二军三十四师的政委）找我谈话了，石政委当时大约四十五、六岁，他不像李东林那样凶神恶煞，倒显出一副学者风度。就我们二人在一间小房间里，对面而坐，他让我从祖宗三代谈起，谈自己的小学、中学、大学的生活和成长经历，谈“文革”当中思想的演化过程，谈对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

他显得极有耐心与教养，在交谈当中，我以请教老师的方式向他提出了大量的问题，如：南昌起义的领导者是周恩来还是林彪？毛主席在井冈山是同朱德会师还是同林彪？平型关战斗中，林彪是怎样负伤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决策是否全部正确？三次放弃哈尔滨是否都是正确的？主张打锦州究竟是不是林彪的决策？“毛主席这样的天才，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这个账是怎么算的，这句话有没有道理？……。我用请教的方式，把我在“文革”中形成的近百个观点全盘托出来了，每当我提出一个问题，石政委总是耐心地听着，然后说：“你不要问我，你说你的……”。他表现出在沉思的样子，一直不停地吸烟。那天，他从傍晚太阳还没有落，一直同我谈到第二天，也就是“五·一”节，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才结束谈话。我注意到，他一夜吸了三盒烟。

谈话结束时，石政委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小朱，你还年轻，也很聪明，你应当有勇气活下去；第二句是：你对政治感兴趣，但是，我告诉你，搞政治是要拿脑袋换的！”这两句话既是对我的鼓励，也是对我的告诫，我牢记了一辈子！我时常想，在那样疯狂的年代，在重灾区的军队里，竟然能遇到这样有见识、有思想的政委，实属难得，这也是我的幸运啊！从此往后，不论身处逆境还是顺境，对于“政治”，我只愿当观众，而不再当运动员了。

石政委谈话之后，我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虽然我还被秘密单独关押，但是没有人骂我，更没有人打我，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我能享受这样的待遇，恐怕也算是奇迹了。这大概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吧！”专案组派了我系的青年教师某某看管并负责我的生活，此人我很熟悉，他心地善良，虽然在政治上认为我很“反动”，但在生活上还是很关心我的。粉

碎“四人帮”之后，他曾两次专程到我家，向我赔礼道歉，我都以礼相待，我说：“你没有什么对不住我的，你看管我，是当时组织上安排的，你不管，也会派别人来管，你没有陷害我，也没有虐待我，当时我不能要求你同意我的政治观点，我对你只有感谢，没有怨恨。”

在石政委的安排下，我被秘密审查期间，生活上没有受委屈，每天有一道荤菜，能吃饱，伙食比普通学生还好，作息时间基本上自己安排。笔墨按需求供应，只是发给我的每张纸上都编了号，我写的每一个字都被专案组拿走，写错了也不能自己撕毁。在做了那个奇怪的梦之后，我就拿定主意，我要以好的态度配合专案组，一切为了不被枪毙，一切为了活下去，为了在毛主席百年之后，我能重见天日。

1970年“五·一”之后，我开始系统地交待自己的“反动思想”，我给自己立了四条规矩：一是，交待问题，罪名帽子要大，显得诚恳，但是，内容要实，我“攻击”的内容，要么是历史事实，要么是出自马、恩、列原著；二是，我所交待的问题，在当时是“反动”的，但是，在林彪、江青等人垮台之后，要有翻案的把握，绝不能乱交待；三是，我所反对，并希望打倒的只限于六个人：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交待材料不涉及更多的大人物，因为我相信在毛主席百年之后，在另一种气候下，这六个人是一定会完蛋的；四是，一人做事一人当，“文革”当中，我极少与本系、本班的同学接触，我交待问题，不涉及别的同学。相反，专案组要我证明别的同学的“反动”思想观点时，我都尽可能地赖到自己的头上，反正，虱子多了不怕痒。

我把自已所谓的“反动思想”分成了十几个大问题，如：关于毛泽东思想，关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关于林彪，关于江青，关于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关于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关于知识分子政策，关于备战与第三次世界大战，关于斯大林等等，我都用了吓人的大帽子做标题。如：“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疯狂反对敬爱的林副统帅……”。五、六两个月，我在没有太多干扰的情况下，写了近20万字的交待材料，大体上全面真实地反映了我在“文革”初期三、四年内思考的一系列问题。

这期间，专案组曾经四次押着我去参加安徽省在合肥体育场召开的公审公判大会，每次大会参加的民众都多达几万、十几万人，每次枪毙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每次大会，专案组都让我坐在距离跪着等着被枪毙的人几米远的地方，让我“受教育”。会议一结束，我就被专案组押回关押地，顾不着吃饭，专案组就责令我背诵毛泽东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两篇文章，然后要我谈参加公判大会的感想，他们责问：“是你的罪大？还是那些被枪毙的人罪大？难道不是可以枪毙你十次吗？”

经过三个多月的审查，专案组大体上查清了我的问题。其实，除了查抄的我的读书笔记，日记之外，并没有找到我的什么罪证。他们找了我所有的同学、老师和接触较多的人，没有人了解我的“反动思想”，他们派人到我的家乡、我的小学、中学母校外调，也一无所获，我从小到大，绝对是好孩子，好学生。我们系的总支书记孙文凯，系主任廖伯石，辅导员潘锦杜都证明我“本质好，一时误入歧途”，甚至连我们系军宣队刘政委都为我说情，还流了泪。

除了我1969年12月30日夜里在安庆的那次“失言”外，没有人能检举出我的任何“反动言论”。我是个实实在在的“思想罪犯”。因此，七月中旬，专案组就把我从合肥工业大学押回我们系驻地——安徽省白湖劳改农场了。到农场后，只对我进行过一次大会批判。因为我的“观点太反动”，上级决定不向师生公开，所以，批判会开的很空洞，只是喊了“打倒”，“罪该万死”，“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口号。正因为如此，我们班的同学直到2008年“校庆50周年”见面，还在问我：“你当年究竟因为什么事挨整啦？”

1970年7月下旬，中央终于决定，六九、七零两届大学生要分配工作了，这时，我们班的许多同学还没有人身自由，还在被审查中，我们班45人，高干、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不少，当年全国各地的高考状元多，客观上看，同学当中，不少人心高气傲，比较有思想，这就决定了在那种专制暴政的社会是不会有多少生存空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我们班有40人左右被审查，三分之一左右的人被打成了“反革命”，后来，几乎全被发配到边疆各地接受再教育，“文革”后，有些人选择了到国外定居，几十年后，同学们相聚时，不少旅居海外的同学泣不成声地说：“选择出国，也是出于无奈啊，不是我们不爱国，是我们的国家不欢迎我们这一类喜欢独立思考的人啊！”

分配之前，全班同学都是灰溜溜的，有的下地干活，有的还在写交待材料，人人心事重重，这时互相见面，也都不敢打招呼了。谈话一定是遵命行事，记得工军宣队就曾派我们年级四班的团支书找我谈心。因为我是一班的团支书，我们又都是江苏老乡，照理说是很有感情的，但是，在那个年代，人性是完全被扭曲的。他找我谈话时，倒也很动情，他声泪俱下地说：“老朱啊！我万万想不到你会堕落到这个地步！你怎么能那样丧心病狂地反对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呢？他可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呀！他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呀！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伟大的接班人呀，你反对他，不就是同全国人民、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作对吗？你这是在挖我心上的肉呀！……”我相信他在当时是真诚的，今天想起来，我们当年的那种意识形态还真有点像拉登的邪教呢！迷信可以使聪明人变成白痴，在那时，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沉默。

七月下旬，专案组要对我的审查下结论了。那时，公、检、法已经被“砸烂了”，军管会掌握着生杀大权，专案组只要把结论报军管会就可以决定了。所以，要判一个人，甚至要杀一个人，都很容易。专案组第一次找我谈话说：“念你一贯表现较好，一时误入歧途，初步决定判你15年徒刑，你要感谢党，感谢毛主席给了你第二次生命。我当时只盼能活下来，只盼未来时局变化，这个处理我已经知足了，我又能说什么呢！于是，我当天就用大头针扎破了十个手指，写了一份血书，大意是：我崇信共产主义理想，我愿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现在只有一个请求，尽快送我去淮南煤矿劳改，我愿意以自己的血汗报答人民的养育之恩，二十多年的“教育”，使我变成了政治动物。第二次找我谈话，说有可能只判七年；第三次找我谈话，告诉我不判刑了，可能要留校管制劳动两年，这更出乎我的预料了。

若干年后，我才听说，我们中科大的这批学生能够被从宽处理，还要多亏周恩来的恩准。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安徽省搞的特别“左”，简直视中科大为敌对势力。大批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十几位师生含冤自杀。对此，北京留守的工军宣队和中科院工作组是有不同意见的，他们向中科院反映，当时中科院革委会主任刘西尧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在这个报告上批示：“中科大的革命小将将在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学习游泳，他们还不会游泳，呛了几口水，现在是让他们自己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不是整他们的时候：”，正是这个批示，挽救了我们这批学生。

到了八月三日，专案组领导对我说：“组织上认为你们这些人还有改造过来的希望，决定不判刑，给你们分配工作，但是，你的问题那么严重，是要开除你的团籍的，你要感谢党和毛主席，要好好改造，不过，像你这种人，改也难！”我说：“我1963年就入党了，后来按省里的统一规定停止了组织生活，1966年5月我又第二次入党，系总支也批准了，因为文革，党委未按时审批，这怎么说呢？”他们说“像你们这种人还提入党？”然后给了我分配工作志愿表，我填的第一志愿是内蒙古大草原，第二志愿是云南西双版纳。军代表当即问我：“你为什么要去这两个地方？”我说：“自古以来，罪犯都是发配边疆充军的，我愿意自我充军。”军代表训斥道：“你很狡猾，你想偷越国境，叛国投敌！”我气愤地说：“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军代表责令我重报志愿，我拒绝了，我说：“你们随便分吧”。当晚，军代表很得意地告诉我：



“组织上决定，把你分配到河南省，中原大地，看你能往哪里逃！”我冷冷地说：“那就让历史回答你吧！”

我就在这种惨境下“毕业”了。工军宣队给我做的毕业鉴定，简直就是一张判决书，在介绍了我的出生年月和籍贯后，写道：“由于长期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思想逐步走向反动，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疯狂反对敬爱的林副统帅，疯狂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疯狂反对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疯狂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疯狂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的鉴定只有一条优点：“热爱劳动”。通篇都是吓人的“罪状”。这就是我的“毕业”鉴定！这就是党给我开的走向社会的“通行证”。当时，军宣队小头目曾经很得意地对我说：“你这一辈子，不管走到哪里，再也逃不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掌心了”。

“文革”中，工人阶级占领了学校，我们的大学毕业证上，没有我们校长郭沫若的签名印章，也没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公章，盖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工人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印章。大学文凭上盖这种不伦不类的印章恐怕是古今中外的奇闻。“文革”后，学校通知我换发毕业证，我决定不换了，就让这个历史的耻辱永存下去吧。让后来人知道，中华民族曾经经历过怎样一个荒诞的时代。

1970年8月5日，我拿着这一份派遣证和我系的同学一起从白湖出发，坐轮船途径巢湖到合肥，再转火车就各奔东西了。就是上了轮船，我们也还没有自由，还有解放军跟着，害怕我们临走前再搞什么“反革命串联”。毕业时，我们没有毕业合影，没有毕业典礼，没有师生告别，有的是满腔愤恨和对未来的茫然。我们从白湖到合肥，在轮船上呆了七、八个小时，多数同学没有吃一口饭，没有说笑，没有告别，呆呆地坐在甲板上沉思……。我们的大学生生活结束了，我们上了什么样的大学啊？在校六年，只是上了两年课，四年时间搞“文革”，换来的是“反革命”身份，直到上火车之前，我都没有半点自由，审查我四个多月，我连理发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好在我的头发长的很慢，否则我就成了现代的“白毛女”了，坐着轮船，一路悲怆，满目迷茫，我的未来在哪里？我的命运又会怎样？但是，不管怎么说，我总算是离开了审查室，离开了中科大，离开了安徽，该诅咒的安徽！大学生活不堪回首！

~~~~~  
【岁月沧桑】

## 对知青50周年的历史与哲学反思

• 邓晓芒 •

〔本文为长沙市2014年11月2日作者在纪念长沙知青下放江永县50周年论坛上发言的讲稿。〕

今年是我们江永知青1964年大批下放的50周年，在此前后也有部分知青下放江永，也和大家一起纪念这个日子，一起来反思这场中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我们个人来说，这也是我们人生旅途中最重要的一站，我们在这里转向了一个我们从来没有预料到的充满坎坷的道路，决定了我们一生的命运、世界观和价值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所启动的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反思，它关系到我们对自己一生的评价。在50年后的今天，与当时相关的诸多恩怨都已经淡化，我们才有条件来对这场运动做一番远距离的冷静的审视，这种审视也才能有可能是客观的、贴近真相的。

## （一）

首先我们要进行一种历史的反思。刚才讲了，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为什么史无前例？是由于当时的领导人的突发奇想，更是因为当时的政府是一个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全能政府”。现在一般认为，60年代的大规模上山下乡主要原因是当时由于大跃进的失败，工业凋敝，经济崩溃，城市就业困难，为了社会的稳定，必须将大批待业青年和刚刚毕业的中学毕业生赶到广阔的农村，让农业生产消化掉剩余劳动力。这些当然不算错，有大批文献和事实作依据，但是非常表面，还应该做进一步深入的思考。

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是，在历史上，有哪一个政府解决失业和劳动力过剩的问题是采取这样一种方式的？古今中外，只此一家。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或者说，这本质上不是政府的问题，而是老百姓自己的问题。小民百姓从来都不是靠政府“安排工作”，而是自谋生路，各显神通，鱼有鱼路，虾有虾路，而且一般说来，城里总比乡下的机会多。读书人呢，有科举的路，科举不第，也还可以当幕僚、教私塾，帮人写对联、写信和写状纸，算命看相行医，做乡绅和“喊礼”，也可以经商做生意。像“孔乙己”那样穷困潦倒的毕竟不多。

到了现代社会，城市发达，科学昌明，专业分工明确，开始有了“失业”问题。这或者是由于专业设置不当，或者是由于经济不景气，而当局解决这类问题，通常是通过调整专业培训和第三产业、减少税收、扶持中小企业的办法，或者是政府投资兴办公共工程的办法，却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是通过把有文化的剩余劳动力赶到农村去的办法，这相当于一个国家的自杀，断绝了未来发展的前途。

中国当时的情况，是刚从三年饥荒中走出来，百废待举，第三产业极端匮乏，人民生活极端不便，各行各业需要大批有文化的人才。那个时候在城里，人们的生活水平极端低下，工资极低，只求有口饭吃。有的家庭靠母亲在街道工厂糊个纸盒什么的，就能够供家里几个孩子念书，虽然非常困难，也能勉强度日。文革后期赶人下乡的口号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但我从来没有看见谁在城里吃闲饭，只要赖在城里，总能找到工作。

所以我认为，当年中国城市并不存在真正的劳动力过剩和失业的问题，相反，只要放开让大家去各自谋生，只会有劳动力不足、特别是有文化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然而，为什么的确又有大批中学毕业生无法安排工作呢？这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政府不愿意放开让百姓自谋生路，而要把就业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保证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压制街道工厂和市场的自然发展。60年代的街办工厂和小集体单位自负盈亏，搞物质刺激，被视为如同农村的“三自一包”那样的非社会主义企业，是绝对不容许其坐大的。这就使得街道企业和小集体吸收劳动力的容量大大受限。

另一方面，由于要贯彻“阶级路线”，那些家庭“有问题”的学生的确面临如何处置的问题，必须把一部分学生打入“另册”，以制造“阶级矛盾”，巩固和加强红色政权的合法性。这两方面都是极左意识形态的实践效应。文革后期，特别是1968年以后，这一套办法也成为解决红卫兵造反派这些社会不安定因素的现成手段。

再加上，政府通过户口制度，对百姓、特别是有文化的人掌握着绝对的人身控制权，因而能够对成百万的知识青年任意驱使，能够轻而易举地干成这件在任何一个现代社会中都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这是对极左意识形态控制整个社会、为所欲为的制度上的保证。

第二个要考虑的问题是，我们这些极左意识形态的受害者，为什么在当时对这种不合理理

的倒行逆施不但没有清醒的意识，反而有很大一部分人真心拥护，自觉自愿地以极大的热情把自己的青春投入这一“划时代的”“伟大事业”，还觉得自己特别光荣、特别真诚？即使是那些对于上山下乡抱有反感、恐惧、无奈和痛恨的知青，也觉得自己没有正当的理由来抵制这种强加于自己的命运，反倒觉得自己有种想当“逃兵”的不光彩？这就涉及到我们从小所受到的那种格式化的教育和洗脑，是必须彻底反思的。

近年来，已经有不少人反思了49年以来我们所经历过的那种极左的意识形态，有的追溯到苏联模式，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有的追溯到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还有的追溯到了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所有这些当然都是必须清理的，但是我还没有看到一个人把这种极左思潮追溯到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历史的惯性。

我历来认为，中国革命的实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次农民起义，而农民意识里面浸透着的是皇权意识。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农民国家，这是中国皇权专制体制的深厚的基础。每个农民出自本能地想当皇帝，或者是梦想着有一个好皇帝从上面赐给他阳光和雨露。毛泽东作为农民革命的领袖，首先就牢牢抓住了最底层的农民、特别是农村的流氓无产者的心，以中国贫苦农民的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并且很自然地与现代世界的民主运动大潮混为一谈。但国际上的民主思潮讲的是自由和平等，而东方包括苏联和中国等国家的民粹主义则极容易从大众崇拜转为个人崇拜和英雄崇拜。因为农民讲平等，不过是要由一个他们所佩服的、为他们说话的领袖带领他们“闹翻身”，把他们上面的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夺过鞭子揍敌人”。整个过程都需要仇恨，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这就是“革命”这个概念的真正含义。

但传统的皇权专制一旦坐稳了天下，通常都要从这种农民革命的仇恨激励转向社会和谐，所谓“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必须将儒家伦理的“忠恕之道”重新抬出来，对老百姓施“仁政”。而中国革命胜利后，为什么几十年一直沿用着“马上治天下”的思路来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呢？这是因为时代不同了，当今的“天下”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而是“世界”。在世界没有统一以前，毛始终只能是“王”，甚至只能是“山大王”，而不能称“霸”。为了继续“反霸权”或者说“争霸”，还只能以“马上得天下”来治国。所谓“输出革命”不过是毛的“合纵连横”争当国际霸主（世界革命领袖）的策略。

因此，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中，有几个因素是最关键的。一个是“革命”，革命有天经地义的合理性，从小就要干革命，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人生的意义就在于献身于革命事业。其次是仇恨，就是“阶级仇，民族恨”，因为革命必须有革命的对象，“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凡是“苦大仇深”的就是革命的依靠对象。第三就是大众崇拜、底层崇拜，或者“劳工神圣”。我们吃着农民种出的粮食，穿着工人生产出的衣服，不为他们服务、不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就是“对不起衣食父母”，就是“忘本”。

所以，上山下乡的意义，一个在于这是一桩“革命事业”，是为世界革命作贡献的壮举，是反修防修、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有效的措施；再一个就是“返本”，回到工农群众中去，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就是看他是不是和工农大众结合在一块。”这些话语在我们当时看来，占据着天经地义的道德至高点。其实这是一种典型的民粹主义教育，它决不能通往现代民主，而只能通往大众崇拜和个人崇拜（两极相通）。我们最崇拜的是那个站在天安门上喊“人民万岁”的人。

所以，上山下乡是在一个由底层农民革命夺取政权之后，由于“革命尚未成功”而始终保持底层那种“泥腿子”的革命精神，蔑视精神文明和文化教养的特殊时代，所诞生出来的一个极左意识形态的畸形怪胎。它的那些打着道德旗号的宣传口号由于符合中国传统底层文化的“正义”性和仇恨心理，特别是符合《水浒传》中的那种痞子文化传统，而具有极大的欺骗作用。

## （二）

因此，我们今天来反思上山下乡，有一个最好的历史条件，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历史已经为这种民粹主义实践作了定论，证明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这场巨大的社会实验是一场“浩劫”（不仅仅是文革），而与此相应的意识形态教育则是一种利用传统文化惯性所进行的系统的洗脑和欺骗。

作为个人来说，我特别不能同意对待上山下乡的这样两种偏向。一种是把上山下乡仅仅看作我们知青的“受迫害”，因而停留在对上山下乡政策的单纯控诉和诉苦的态度上，这种态度并没有超出我们所受的传统教育，也是经不起传统意识形态的反驳的。农村出身的作家刘震云曾经质问：你们知青下乡是“受迫害”，那广大农民世代在乡下生活又算什么呢？你们可以回城、算工龄，农民又能回到哪里去呢？对于这样的质疑，我们将无言以对。

我们的确由于贯彻“阶级路线”而受到了迫害，但我们所受的迫害并不在于吃了多少苦头，而在于我们完全是被愚弄被强制地驱赶到了一个远离城市和文化中心的地方，让我们正在继续的学业受到中断和荒废，这是对个人权利的粗暴践踏。当然，在早年知青回城潮时，用“反迫害”作为旗帜是可以的，但在今天，我们应该有更深层的反思，这不单纯是一个知青群体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都还停留在中世纪，不知人权为何物。

另一种倾向则是把上山下乡尽量美化，觉得那是我们青春时代的一种美好回忆，甚至渴望回到那种没有心计、互相坦诚、天真纯洁的时光，那是我们的“激情燃烧的年代”。于是在我们这个年纪上，一些人有一种强烈的怀旧情绪，并且将这种情绪毫无反思地表现出来，甚至到舞台上公演，唱红歌，跳红卫兵舞，都成了炫耀我们那个时代青春激情的一种公开的方式。我简直觉得这是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

我不否认，每个人的青春都有它值得纪念的地方；然而，并不是每个人的青春都值得历史记住。或者说，人的青春只有附着于历史的反思之下才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能够反思我们当年“由自己所招致的不成熟状态”（康德语），我们的回忆就具有人类经验的价值。否则我们就只好自己私下里纪念一番，自我陶醉于几个朋友的回忆中，而不足为外人道。而在我们身后，这些美好的回忆都将烟消云散，不留痕迹。我们等于不曾活过。

所以，只有经过这样的反思，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才会不仅仅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而且对下一代和子孙后代而言，都具有历史意义。现在有些年轻人对我们这一代十分瞧不起，虽然也唱红歌，但远没有我们当年的虔诚，而是故意用摇滚的、调侃的态度在唱，他们与歌词的内容保持着一段历史的距离，表达着一种批判的态度。我们不要慨叹所谓的“代沟”，这不过是历史的进步而已。这种看不惯只不过表明我们被遗留在历史的滩头，我们搁浅了。

也许有人会说，你老是说历史历史，历史和我有什么相干？但是这样说的人，我要反问一句：你的儿女和你有什么相干？你的孙子辈和你有什么相干？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要给后代带个好样，要把我们一生的经验、我们做人的感悟和觉醒留给后代，不要让人指着后背说：你看，这就是被毁掉的一代。50年前的知青下放经历，足以让年轻一代人肃然起敬，只看我们自己如何对待。

十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走出知青情结》，意思是让我们走出单纯的怀旧和自恋，放眼我们在中国当代历史中所处的境遇，反思人性从朦胧到觉醒的艰难历程，这样来为中国人的国民性提供某种深化的契机。只有这样，我们所受的苦才不会白受，我们青春的激情才不会虚

掷，我们这一代人的痛苦经历才不会毫无痕迹地烟消云散，而会在中国当代启蒙思想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 （三）

最后，我想在这知青下乡 50 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我们每个人都有资格进行一种人生哲学的回顾和反思。我们的生命已经过去了一大半，我们的朋友中有的已经提前离开了我们，他们所面对的死亡不久也会降临到我们的头上，我们对自己的这一生究竟如何评价？在面对死神或上帝的时候，我们能够问心无愧吗？我们绝大部分都不是什么“成功人士”，而是一般的普通老百姓，但我们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在死亡面前，我们都有一个平等的灵魂。

我知道有的知青朋友们到了这个年龄，已经心灰意冷，再也不想事情，不想自寻烦恼。他们拥有了人生阅历这份精神财富，却不知道拿它有什么用。他们开始遗忘，消极地对待人生，相当于等死。但是，我还是希望每个经历过来的人都始终能够有一种积极的态度，抓住我们剩下不多的生命来充实自己、提升自己。我们好不容易到人间来走了一遭，如果草率从事，匆匆忙忙，还没有来得及看清生活的真相，就撒手而去，那就太划不来了。

我体会人生越到后来，越有嚼头，当你有了丰富的人生阅历，你再回过头来看自己走过的道路，你会看得更透，你对自己就把握得更深。年轻时候我读哲学，一位朋友的父亲对我说，哲学是要到 45 岁以后才读的。虽然我并没有听他的劝告，但我觉得他说的也有一定道理，但是要反过来理解：哲学到了老年以后才会有切身的体会，才知道它的用处何在。

不论对哲学有没有兴趣，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哲学，只是他没有意识到而已。哪怕你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也是你的哲学。我们平时忙于生活，无暇顾及思考生活，但其实我们是有机会接触到哲学的。在我们的人生中，第一个接触哲学的机会是我们在乡下感到绝望，前途一片渺茫，时常百无聊赖的时候，那时我们常常想到的是怎么打发这些暗淡无光的日子。我本人就是在那个时候进入到哲学中来寻求光明的，一旦找到，就不离不弃地走到了今天。

第二个机会就是当前了。在我们这个年纪上，生活的重担已经逐渐卸下，我们的眼光更多地不是展望未来，而且回顾过去，我知道有许多朋友们会感到人生的破碎，一地鸡毛，不堪收拾。当然也有得意的，觉得自己混到今天有这样，也算不错了。但毕竟现在有更多独处的时光，从 50 年前的那个日子开始，生活像一条红线一般把自己的记忆一直牵引到了今天。如何将这条红线理出个头绪来，而不至于变成一团乱麻，这就是哲学的功用。

幸好，哲学不是某个人的专利，而是人的本性。当你在孤独的时候，当你在感到自己不久于人世，需要进行一番思想清理的时候，你会知道，只有哲学能够帮你走出迷惑，将破碎的人生整合成一个完整的人生。你最后的这个完整的形象，就是你一生的形象。

□ 原载《共识网》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华夏文摘》网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邮箱： <a href="mailto:tougao@cnd.org">tougao@cnd.org</a> 其它事项请电邮：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             |          |

---